论后蜀的文治政策与《花间集》的编纂原则*

李博昊

[摘　要]《花间集》是在后蜀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文治政策的背景下成书的，赵氏家族编纂此书乃是为向蜀主孟昶传达忠心为臣之意，故《花间集》的编纂在本着一定的文学原则的同时，更有着一定的政治考虑。《花间集》中诸多细节透露出其不仅是一部符合后蜀宫廷审美习尚与文治政策的唱本，更隐含着赵氏家族趋奉孟昶的政治心绪。观《花间集》编纂后的流播情况及赵氏家族的结局，《花间集》或许达到了其编纂之目的，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保障家族平安的政治作用。

[关键词]《花间集》　后蜀　文治　赵氏家族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8）05-0171-06

《花间集》由后蜀勋臣赵廷隐之子、卫尉少卿赵崇祚主持编纂，成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前后。此时赵廷隐虽居高位，但在后蜀新主孟昶削减武将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文治政策的政治形势下，仍觉临渊履冰。面对众多勋绩卓著的武将或是夷族或是流放的惨烈情形，赵廷隐最终选择了由武向文的转型。《花间集》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编纂成书的。此书虽由赵崇祚主编，但编纂《花间集》却是家族行为。赵氏家族动用大量人力编纂此书，不仅于词作内容风格的遴选上用力甚多，在编纂形式上更是用心良苦，以期投合孟昶的文学喜好，逢迎后蜀的文治政策，昭示武将家族的转型，表达忠心为臣之意。此是赵家身居要位、全身远祸的一种方法。①《花间集》成书后，或受到了孟昶的肯定而广泛流播，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消除家族政治危机的作用。兹详论之。

一、后蜀的文治政策与《花间集》的选词取向

宋人张俞《华阳县学馆记》言“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②后蜀先主孟知祥初到四川之时，面对“蜀中群盗犹未息”的局面，择廉吏使治州、县，蠲除横赋之苦，安集流散之民，“下宽大之令，与民更始”，③蜀中的经济渐渐得到恢复。后主孟昶“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④他没有披挂上阵、血染疆场的经历，身上少有武将的专横，却多了文人的儒雅。其兵不血刃，通过“擒王”这一简单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地理学视阈下唐五代词研究”（16CZW0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博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副教授（广东 珠海，519087）。

①李博昊：《论赵氏家族的政治危殆与〈花间集〉编纂的政治动机》，《江苏社会科学》2017 年第 3 期。

②[宋]张俞：《华阳县学馆记》，《成都文类》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8966 页。

④[宋]王明清：《挥麈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 292 页。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有效的方式，铲除了军事强将李仁罕等人，扭转了武人跋扈恣睢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而针对五代时期军事将领常拥兵自重的局势，孟昶着力摒弃“武功”，提倡“文治”。其力戒前蜀王衍荒淫骄佚之失，颇勤于政，孜孜求治。罢兵修睦，与民休息，蜀中渐趋安定富庶。至广政二年（939）、三年（940），“边陲无扰，百姓丰肥”。[①]

孟昶抑武事而扬文教，其提倡儒学，主张以文教礼乐治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刻经修史。孟昶“绍汉庙学”，[②]篆刻石经。后蜀石经肇刻于广政初年。宋曾宏父《石刻铺叙》言“益郡石经，肇于孟蜀广政。悉选士大夫善书者模丹入石”。[③]后蜀宰相毋昭裔曾“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昭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④]蜀石经有经有注，为历代石经所罕见。清人杨宝臣言“蜀石经悉遵太和本，为唐代传写之遗，开成仅刻经文，孟氏并镌各注，故可宝贵”。蜀石经刊刻时间长，规模宏大，体例严谨，经注结合，堪为教民之典范。经书可为教化，史书则可为借鉴。后蜀重修史，设有史官史馆，修史制度比较健全。中原的五代修史仅是后代纂集前代在位帝王的实录，无后代修纂前代纪传史之举。而十国中的后蜀，既纂集本朝皇帝实录，又修撰前朝纪传史，是五代十国时期完整继承唐代修史制度的政权。[⑤]后蜀李昊主持修纂四十卷《前蜀书》，又主持修《后蜀高祖实录》三十卷，《后蜀后主实录》八十卷。且有《蜀祖经纬略》一百卷，《枢机集》二十卷，合编当时朝廷的制诰奏议。孟蜀注重修史，其意不仅在借鉴前代兴亡，更在加强政治认同，乃是“文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兴办学校。学校的广泛设立是教民的重要环节，是推行教化的重要途径。此在治蜀历史上有成功先例，可为孟昶借鉴。宋人吕陶在《经史阁记》中说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于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⑥]石室乃是西汉时期蜀中所设立之学校。礼殿指东汉兴平元年（194）蜀郡太守高公于文翁石室之东建周公殿，并画远古君臣圣贤像以祭。九经即后蜀所刻石经。蜀土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教化的推行失去了基本的场所。孟昶于是“作都内二县学馆，置师弟子讲习，以儒远人”。[⑦]宰相毋昭裔亦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⑧]此皆为培养人才，施行教化，维护统治。欧阳炯之忘形交景焕曾言孟昶“承祖纂业，性多明敏，以孝慈仁义，在位三纪已来，尊儒尚道，贵农贱商”，[⑨]其“戒王衍荒淫骄佚之失，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虽刑罚稍峻，而不至酷虐，人颇安之”，[⑩]又“开献纳院，创贡举场，不十余年，山西潭隐者俱起，肃肃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⑪]

第三，镂印书籍。后蜀镌刻石经的同时亦刻印经书以推广教化。四川在唐末已有很多书坊，但其刻印的书籍多是阴阳杂记、字书小学等。始至后蜀，毋昭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经》”。自毋昭裔雕《九经》及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文学复盛。[⑫]后蜀镂印推广书籍之举，带有恢复文道、提倡教化之目的，亦是孟昶文治政策的重要表现。后蜀刻印经书，也镂印文学书籍。在后蜀立国之际，如欧阳炯《花间集序》所言，“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⑬]文学之道受齐梁之风的影响，大有凋敝之态势。前蜀后主王衍“尤酷好靡丽之辞，常集艳体

---

① [宋] 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傅璇琮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6049页。
② [宋] 张俞：《华阳县学馆记》。
③ [宋] 曾宏父：《石刻铺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④ [清] 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69页。
⑤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40页。
⑥ [宋] 吕陶：《经史阁落成记》，《成都文类》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宋] 张俞：《华阳县学馆记》。
⑧ [清] 吴任臣：《十国春秋》，第531页。
⑨ [宋] 王明清：《挥麈录》，第291页。
⑩ [宋] 张唐英：《蜀梼杌》，傅璇琮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6100页。
⑪ [宋] 王明清：《挥麈录》，第291页。
⑫ [清] 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9页。
⑬ [后蜀] 赵崇祚辑：《花间集》，宋刻遥修公文纸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诗二百篇，号曰《烟花集》”。[①] 王衍凡有所著，蜀人皆传诵，一时间浮艳之作风靡，社会风俗习尚亦随文道而凋敝。孟昶有感于此，故试图通过刻印书籍的方式，大力推行教化，引导官民阅读，以建立新的文学和文化风尚。宰相毋昭裔在孟昶的支持下，“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②] 孟蜀所刻印之三种书籍，是现知总集、类书最早的刻本，亦是李唐时期官方提倡阅读的文本。《白氏六帖》注重历史的经验，《文选》注重文体与文辞，《初学记》文质兼备，三者皆与唐太宗的教育要求相吻合，故作为国家重要的教化书籍广泛推行。孟昶刻印推广此类书籍，亦是重教兴文之展现。

孟昶提倡文治，喜好文学，其品位高雅，不喜浮薄之作，《蜀梼杌》记昶“尝谓李昊、徐光浦曰‘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③] 但正如《花间集序》所言，其时教坊所歌之辞多承“南朝宫体”、“北里倡风”，拙俗鄙俚、荒嬉佻达，与后蜀宫廷高雅的文化品尚不相符合。孟昶常创作诗词于宫廷奏唱，自是需要一部高雅的乐歌集以丰富乐伎表演之曲目，赵崇祚家族深谙于此，《花间集》之编纂必定要符合孟昶的文学喜好与文治政策，方可达到取悦孟昶之目的，是以《花间集》遴选词作首求典雅。在词牌的选择上，赵崇祚所录多为“乐府相传”与“豪家自制”。《花间集序》所言之“乐府相传”乃是由汉魏古调衍变而成的古朴雅致的词调，其中以《杨柳枝》《落梅花》《采桑子》为代表。《接贤宾》《赞成功》《满宫花》等未见于《教坊记》，亦未见于敦煌歌辞的词调，即欧阳炯所谓的“豪家自制”。这些自制之词，亦可“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同样展示出《花间集》逐雅的文学品尚。《花间集》迎合孟昶喜好而重视文字与声律。孟昶对字声颇为看重，宰相毋昭裔著有《尔雅音略》三卷，孟昶次子元珏的老师陈鄂仿唐李瀚《蒙求》、高测《韵对》，为《四库韵对》四十卷。崇文馆校书郎句中正精于字学，凡古文、篆、隶、行、草诸书，无所不工。故《花间集序》开篇即言字声：“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青云，字字而偏谐凤律。”“合歌”与“谐律”，明确指出编纂者对于词体内部音律的重视。“剪裁”与“雕镂”，乃是对文字与声律的反复琢磨。此说明如琢如磨的作品在经过“广会众宾、时延佳论”的挑选后，方能进入《花间集》，成为唱词的标准。《花间集》择录词作之时于声调文情的配合上亦十分留意。赵崇祚着力寻求声辞配合最佳的作品，在选调上注重区别刚柔哀乐，同时留意语调的缓急、叶韵的疏密、句子的长短，以增加词作的韵致。《花间集》于众多题材中独钟情于闺情与花柳，集中更多的是如顾夐“为一时艳称”[④] 般的小词。此类作品风格旖旎婉媚，情致幽杳绵长，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典雅的情致，既适合宴会奏唱，又符合孟昶所好。

孟昶崇文，《花间集》选词遂以典雅为基本原则，但值得指出的是，此仅为《花间集》编纂规则之表层，此书的编纂实本着一定的政治原则，以更好地与孟昶的文治政策暗中契合。

二、《花间集》选录“十八”词人的政治喻意

与五代时期其他词集不同，《花间集》收录十八位作家。此举看似无心，实是经过慎重的考虑 。因为从汉代开始直至唐五代时期，“十八”皆非普通数字，而是带有一定政治文化内涵、人物群体指代的符号，具有丰富的内蕴。

“十八”带有政治文化意蕴或始于汉代。《史记》载汉高祖“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⑤] 《汉书》记“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⑥] 此十八人曾辅佐刘邦开疆拓土、一统江山，功勋卓著，故裂土封侯。这个群体是汉初天下的中流砥柱，于君民心中有崇高地位。

① [清] 吴任臣：《十国春秋》，第 531 页。
② [清] 吴任臣：《十国春秋》，第 769 页。
③ [宋] 张唐英：《蜀梼杌》，傅璇琮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 6093 页。
④ [清] 吴任臣：《十国春秋》，第 813 页。
⑤ [汉]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 2028 页。
⑥ [汉]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527 页。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以“十八”这一数字隐隐带有政治色彩，渐渐深入人心。至唐，“十八”的政治意蕴愈加浓厚。唐高祖李渊因秦王李世民功大，前代官位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又开天策府，并于天策府开文学馆，延四方文学之士。《旧唐书》记“始太宗既平寇乱，留意儒学，乃于宫城西起文学馆，以待四方文士”，又“寻遣图其状貌，题其名字、爵里，乃命（褚）亮为之像赞，号《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以彰礼贤之重”。[①] 李世民文治武功，其仿汉高祖封十八列侯之举，确立十八学士，此种行为带有以政治力量引导文化发展之意味，亦含有成人伦、助教化的政治动机。其后唐代君王多有效太宗之举，以显示朝廷对于人才的渴求与尊重。《旧唐书》记武则天时“张易之、昌宗尝命画工图写武三思及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人形像，号为《高士图》”。[②] 唐玄宗开元时下诏以张说、贺知章等人为十八学士，命董萼画《开元十八学士图》，记录十八位学士的姓名、表字、爵位等，并亲自撰写赞文，以示推崇及颂扬。唐十八学士之说影响很大，五代“楚王希范始开天策府，置护军都尉、领军司马等官，以诸弟及将校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图、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号称天策府十八学士。[③] 宋代对“十八学士”亦甚推崇，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亲洒宸翰，画秦府十八学士像，书学士姓名，并御笔题诗二首，以示其延揽人才之心。北宋钦宗、李公麟，南宋刘松年也都曾创作或临摹十八学士图。[④]

唐十八学士之说的影响还渐至宗教、文学等领域。佛教十八罗汉的说法，就是在唐五代时期开始出现并流行。唐高宗永徽五年，玄奘译成《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介绍了十六位大阿罗汉。随着佛经的广泛流传，十六罗汉的信仰及图像流播开来。[⑤] 但或受十八学士的影响，十八罗汉的说法亦产生。唐人李华《杭州余杭县龙泉寺故大律师碑》言“天宝十三年春，忽洒饰道场，端理经论，惟铜瓶锡杖留置左右，具见五天大德、十八罗汉幡盖迎引，请与俱西”，[⑥] 已经有了十八罗汉的记载。苏轼有《自海南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禅月乃五代时期的贯休和尚，《十国春秋》记贯休尝“绘罗汉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像，皆作古野之貌，不类人间。或曰梦中所睹，觉后图之，谓之应梦罗汉”。[⑦] 十六罗汉并两位大士，即为苏轼所谓之十八罗汉。苏轼又有《十八大阿罗汉颂》，言“蜀金水张氏，画十八大阿罗汉”，张氏即前蜀画家张玄，其同贯休一般“攻画人物，尤善罗汉”，他所绘制之十八罗汉，所本或是贯休的应梦罗汉。五代时期，“十八罗汉”渐渐成习，其中即或有着十八学士的影响。

“十八”对文学领域亦有影响，一些诗文集在编纂时，选录作家数量皆十八位。这些诗文集或与宫廷宴饮相关，或带有教化的动机，《花间集》同样带有这样的编纂目的，其编纂体例的设计，颇有可能受此类诗集的启发。如唐代许敬宗编纂之《翰林学士集》录贞观年间唐太宗、许敬宗、上官仪、长孙无忌等十八人的宴饮唱和诗 50 首，分为十卷。而《花间集》选录十八位词家 500 首作品，亦分为十卷，与之极其类似，或有《翰林学士集》的潜在影响。唐代殷璠录武则天末期至李隆基开元时期丹阳郡包融、储光羲等十八位诗人的创作而成《丹阳集》，书前序言指出其时诗道大有凋敝之态势，当崇尚建安风骨，反对齐梁绮靡，力求永明规矩，在诗歌的选录上体现出盛唐诗声律风骨皆备的特点，某种程度上带有变革风俗、化成天下的意味。《花间集》与之有着诸多相似：地域性较为明显，有着教化的目的，强调声律格调，选录十八位作家，作家中亦皆有宦达与不显者。这其中，暗暗透露出《花间集》对于《丹阳集》的借鉴痕迹。 可见，《花间集》这部文人词集选录的词家数量确定为十八位，意在借助“十八”之内蕴与影响，提升《花间集》的政治文化地位，以迎合后蜀的文治政策，其中既有仿效唐代君王“彰礼贤之

---

①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 5931 页。
② [后晋] 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第 2915 页。
③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 9208 页。
④ 王隽：《“十八学士图”的绘制、衍变及其文化内涵》，《文艺评论》2015 年第 2 期。
⑤ 于向东：《五代、宋时期的十八罗汉图像与信仰》，《民族艺术》2013 年第 4 期。
⑥ [清] 董诰：《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3234 页。
⑦ [清] 吴任臣：《十国春秋》，第 672 页。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重”的意味，也包含以集中十八位词人引领文学风尚之动机。另外，为发挥《花间集》引领文学风尚的作用，赵崇祚为集中所录的十八位词家皆标注了姓名（字）与职官，《四库全书总目》谓“于作者不题名而题官，盖即《文选》书字之遗意”。[①]《花间集》意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告集中词人词作的地位，入选的十八位作者，是后蜀推崇的词家十八学士，此亦呈显出《花间集》“标准本”的地位。

三、《花间集》不录帝王词的政治暗示

《花间集》所录十八位词家中并无帝王，这与相近时期的其他词集有着明显差异。《花间集》的姊妹书《尊前集》录有唐玄宗的《好时光·宝髻偏宜宫样》，唐昭宗的《巫山一段云》之“缥缈云间质”“蝶舞梨园雪”，后唐庄宗李存勗的《阳台梦·薄罗衫子金泥缝》《忆仙姿·曾宴桃源深洞》《一叶落·搴珠箔》《歌头·赏芳春》等众多帝王词。就词之内容及风格而言，《尊前集》所录帝王词与《花间集》中词作相仿，然《花间集》却未收帝王之作，此或是赵崇祚出于政治因素而有意为之。

第一，《花间集》不录李唐帝王词乃是出于对唐皇室的尊崇。后蜀尊唐，《容斋随笔》言“蜀本石《九经》皆孟昶时所刻，其书‘渊’、‘世’、‘民’三字皆缺画，盖为唐高祖、太宗讳也”。[②]孟蜀避唐讳，还曾模仿唐朝而刻印经书、修纂史书，此皆是其仰慕唐朝的表征。唐玄宗与昭宗均有词作，但此时词体文学仍为“小道”，尽管赵崇祚有意提倡，词之文体地位仍不可与诗文比肩。贸然将李唐帝王之词收至歌集中以佐酒宴清欢，似有不尊之意。且玄宗与昭宗的命运常引人悲慨，他们惨淡的人生结局从某种角度而言亦与音乐相关，或出于对李唐统治者的推崇，《花间集》略去了见证这些历史片段的帝王之作。

第二，《花间集》不录五代君王词乃是出于后蜀对地方性政权的否定。后蜀高祖孟知祥本为后唐将领，在后唐气数将尽之时割据四川，建国称帝。对于后唐来讲，孟氏当属叛臣，孟蜀不愿提及于此，故处处以李唐为尊，强调正统。孟昶避李唐君王之讳，却不避后唐之讳。《容斋随笔》言“昶父知祥，尝为庄宗、明宗臣，然于‘存’、‘勗’、‘嗣’、‘源’字乃不讳”，[③]此表明孟蜀对于后唐不认同的政治态度。后唐庄宗李存勗“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创制了很多词作，庄宗溺于享乐，为帝仅三年有余便死于乱军之中，其词纵风流可爱，亦是亡国之音。或鉴于此，赵崇祚未收庄宗词入《花间集》，且对于李存勗所用的词牌《阳台梦》《忆仙姿》《一叶落》《歌头》等，《花间集》亦不曾收录。后蜀对后唐的疏离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花间集》不录前后蜀帝王词。《花间集》未录王衍之词，除不认可前蜀政权外，乃是借鉴前蜀亡国的教训。前蜀后主王衍失国与后唐庄宗有相似之处，纵然王衍“凡有所著，蜀人皆传诵”，[④]词作流播广泛，赵崇祚仍未将其选入《花间集》，以防官员沉迷、百姓相习。《花间集》亦不录后蜀孟昶之作。孟昶喜制小词，其词亦工稳高雅。但唐五代时词之文体地位实难与诗文并提，词或为酒宴樽前聊佐清欢之具，或是文人相竞的文字游戏，常被视为“小道”。此种情况下，录孟昶词作入《花间集》中以佐酒宴之欢似不甚得体，将之流播于天下更易形成君王耽于乐舞之舆论，于统治有大弊。《花间集》既为取悦孟昶，自不能行此举。

四、《花间集》在后蜀的声望地位

《花间集》所确立的编纂原则极大程度上迎合了孟昶的文学喜好，亦与后蜀的文治政策相吻合，故此书编成后或受到了孟昶的肯定，在后蜀宫廷之中有一定的声望，不仅成为了唱词中的标准本，甚至刊刻以行蜀中，成为编书之人仿效的对象。

《花间集》现存最早刻本为南宋晁谦之跋本，双照楼覆正德本吴昌绶叙言晁谦之“跋称‘建康旧

---

①[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23页。
②[宋]洪迈：《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9页。
③[宋]洪迈：《容斋随笔》，第49页。
④[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第531页。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有本’、‘是正复刊’，盖其守郡时也”。[①] 绍兴本《花间集》的跋语乃晁谦之为建康府守郡时（1145—1148）所作。其言“建康旧有本”，表明在作跋语之前，建康已有《花间集》流传。清人杨守敬曾言：“《花间集》十卷，末有绍兴十八年晁谦之跋，谓以建康旧本复刊。避宋讳并避嫌名，如‘镜’、‘树’等字。”又言：“近时有海源阁翻刻本，言以淳熙十一、十二等年册与纸印行，其每卷题目尚是北宋之式，是此又为晁氏所节删，而其本‘镜’、‘树’等字，却皆不避，岂杨氏重刊时，将其缺笔补之耶？杨氏以藏书名，不应鲁莽若此。岂虽为南宋所印，而实刊于北宋，故不避‘镜’、‘树’等字耶。”[②] 杨守敬依据《花间集》的避讳情况，认为此书曾刻印于北宋。然根据后蜀的文化情状，可揣度《花间集》的刊刻时间或早于北宋。后蜀发达的刻书业，使《花间集》的刻印成为可能。

四川刻书名扬寰宇，有“蜀刻甲天下”之说。赵崇祚编纂《花间集》时官卫尉少卿，乃文官中地位很高者，其或曾参与刻印各种书籍之事。后蜀林罕有《说文》学著作《林氏字源编小说》，林氏自序言明德二年（935）“与大理少卿赵崇祚讨论，成一家之书”，又言“古人穷困湮厄而述作兴，罕也卧疾数年，饱食终日，思有开悟，贻厥将来，非欲独藏私家，实冀遍之天下。乃手书刻石，期以不朽”。[③] 林罕一生落魄不羁，而《林氏字源编小说》撰成不久即可刻石蜀中，颁示学界，或与赵崇祚的参与推荐相关。[④] 将书籍“刻石”远难于“刻印”，赵崇祚既可推动书籍刻石，刻印自身主持编纂的《花间集》当非难事。《花间集》成书的广政三年（940）亦是长于刻印书籍的毋昭裔政治平顺即将升为宰相的时期，其刻书之业也在这个时候不断扩大。刻书业如此蓬勃的环境中，《花间集》受到皇室肯定后刊刻流播以成典范，颇为可能。宋人尤袤《遂初堂书目·乐曲类》录有《唐花间集》。[⑤] 明代顾梧芳《尊前集引》言“先是，唐有《花间集》，及宋人《草堂诗余》行，而《尊前集》鲜有闻者久之”。[⑥] 二人皆言唐时即有《花间集》。五代这一历史时期常被划入“唐”的范畴，若此，《花间集》极有可能在五代时期刊刻。明人杨慎《词品·毛文锡》言《花间集》久不传，“正德初，予得之于昭觉僧寺，乃孟氏宣华宫故址也”。[⑦] 昭觉寺乃蜀宫旧址，此或可为《花间集》曾刊刻于五代的佐证。

《花间集》成书后，蜀中还出现了模仿其体例的书籍。后蜀监察御史韦縠曾编纂歌诗集《才调集》。此书成于后蜀广政六年（943）以后，[⑧] 晚于《花间集》成书的广政三年（940）。《才调集叙》言“今纂诸家歌诗，总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为十目，曰《才调集》”。[⑨] 该书选人一百八十家，选词1000首，亦分十卷，每卷100首。类似《花间集》选人十八家，选词500首。但别于《花间集》的是，《才调集》乃为千、百、十之数而收诗，是先划定一个框架，确定编者总数、分卷数而收诗，可能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书籍的编纂工作。《才调集》选诗内容上亦力合风雅，以救时弊。其专收可供演唱的“歌诗”，编纂的方式体例亦有模拟《花间集》的痕迹，或是为仿《花间集》而编纂的另一部乐歌集。《花间集》被时人模拟表明其确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地位，而这正是编纂《花间集》的赵氏家族政治平稳的佐证。

中唐以来，战乱纷起。黄巢祸后，疮痍满目。书籍或毁于战火，或散落各地。《花间集》别于温庭筠《金荃集》、王衍《烟花集》而进入北宋，并广为流传，同样表明此书曾于后蜀宫廷民间流行。是以赵氏家族“广汇众宾”、“时延佳论”所编纂之《花间集》，或受到了孟昶的肯定，昭示着赵氏家族迎合孟昶之文治政策、由武向文转型的成功，亦在赵廷隐力保家族平安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责任编辑：王法敏

---

① 蒋哲伦、杨万里：《唐宋词书录》，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17页。
② [清] 杨守敬著，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168页。
③ [清] 董诰：《全唐文》，第9291页。
④ 闵定庆：《花间集论稿》，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⑤ [宋] 尤袤：《遂初堂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4页。
⑥ 金启华：《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49页。
⑦ [明] 杨慎：《词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⑧ 刘浏：《〈才调集〉编选者韦縠生平考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⑨ [后蜀] 韦縠：《才调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